



陈锦华文集

下 册

中国石化出版社

[HTTP://WWW.SINOPEC-PRESS.COM](http://www.sinopec-press.com)

陈锦华文集

下 册

中国石化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陈锦华文集 / 陈锦华著. -- 北京 : 中国石化出版社, 2013.9
ISBN 978-7-5114-2179-1

I. ①陈… II. ①陈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
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115320号

责任编辑 蒋 琦 杨思湘

未经本社书面授权,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被复制、抄袭,
或者以任何形式或任何方式传播。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中国石化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北京市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 58号

邮编: 100011 电话: (010)84271850

读者服务部电话: (010)84289974

<http://www.sinopec.com>

E-mail: press@sinopec.com

北京图文天地制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787 × 1092毫米 16开本 57.5印张 634千字

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 128.00元(上下册)

(如出现印刷质量问题, 请与我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)

第五章

国家计划委员会时期

(1993年3月—1998年3月)

- 1993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来龙去脉和“软着陆”成功
-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
- 国家计委领导班子届中考察的述职报告
- 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（草案）的报告
- 国家计委要有新面貌
- 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理念
- 抑制过热需求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治本之道
-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扩大开放上开创新局面
- “让城市生活更美好”不能道德缺失
- 发展环保产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支撑
- 印度是中国的一面镜子

1993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来龙去脉和 “软着陆”成功*

中国经济的发展，曾多次经历过“正常—过热—调整—偏冷”的怪圈。这种多次反复的怪圈，长期困扰了中国的政府。中国经济能不能走出这个怪圈？能不能走上快速、持续、健康发展的轨道？1993年开始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，回答了这个问题：中国可以走出怪圈。

市场经济要不要有维护公众利益的政府干预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不要和能不能实行宏观调控？1993年宏观调控的实践回答也是肯定的。

1993年3月，我调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。宏观经济过热的问题再次摆到了国家计委面前。在党中央、国务院的领导下，国家计委坚决落实中央的宏观调控决策，坚持搞好总供给和总需求的总量平衡，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、货币政策，控制物价，调整经济结构，针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不同情况，实行有上有下、有进有退、进退适度的灵活调控措施，既有效地抑制了通货膨胀，又保证了经济的持续、快速增长。1996年成功实现了“软着陆”，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积累了经验。

一、出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

1992年下半年，不断听到要调我到国家计委工作的传闻，开

*本文原载于《国事忆述》（北京，中共党史出版社，2005）。

要 目

第一章	纺织工业部工作时期 (1976年10月以前)	1
第二章	上海工作时期 (1976年10月—1983年2月)	83
第三章	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时期 (1983年3月—1990年9月)	265
第四章	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时期 (1990年9月—1993年3月)	377
第五章	国家计划委员会时期 (1993年3月—1998年3月)	489
第六章	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时期 (1998年3月—2003年3月)	613
第七章	离休以后 (2003年以后)	747
第八章	回顾半生经历 撰写《国事忆述》	873

目 录

第五章 国家计划委员会时期

(1993年3月—1998年3月)

- 1993年宏观经济调控的来龙去脉和“软着陆”成功... 490
- 进一步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..... 533
- 国家计委领导班子届中考察的述职报告..... 537
- 关于1997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执行情况与
1998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(草案)的报告..... 561
- 国家计委要有新面貌..... 579
- 计划工作中的政治经济学理念..... 585
- 抑制过热需求是煤矿安全生产的治本之道..... 588
-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 在扩大开放上开创新局面..... 591
- “让城市生活更美好”不能道德缺失..... 598
- 发展环保产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支撑..... 606
- 印度是中国的一面镜子..... 608

第六章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时期

(1998年3月—2003年3月)

- 九届全国政协的常委参政议政活动和4次访问非洲..... 614
- 博鳌亚洲论坛的创立与发展..... 668
- 从业生涯 企业情结..... 693
- 正确看待企业家群体..... 696
- 把握参加世贸组织的机遇 加快推进中国制造业进步..... 700
- 关于企业成为创新主体的若干问题..... 705
- 企业要肩负起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..... 714

• 企业500强排序变化引发的思考.....	721
• 天道酬勤 厚积薄发 ——远离浮躁 全力提高企业素质.....	728
• “三九”的教训 ——“一个人说了算”的制度性缺陷.....	733
• 推荐《把信送给加西亚》.....	742

第七章 离休以后 (2003年以后)

• 《开放与国家盛衰》序.....	748
• 研究对外开放需要世界的、历史的、发展的视野.....	754
• 开放是更为重要的改革.....	762
• 多元平衡 互惠合作.....	767
• 发挥地理区位与资源优势 推进旅游与工业比翼齐飞.....	773
• 《中国模式与中国制度》序言.....	779
• 论制造业.....	785
• 为建设中国的强大制造业复信工信部领导同志.....	795
• 中日关系大事辑览.....	800
• 友情与认真.....	857
• 先贤祠·帝王庙·黄河坛.....	862

第八章 回顾半生经历 撰写《国事忆述》

• 《国事忆述》中文版自序与后记.....	874
• 《国事忆述》日文版序.....	879
• 《国事忆述》英文版序.....	883
• 《国事忆述》法文版序.....	886
• 《国事忆述》俄文版自序.....	891
• 《国事续述》序.....	895



作者在国家计委办公室（1996年8月）

始我并未在意。到1992年底，由于我的工作去向同研究国家体改委1993年工作安排直接有关，我就在一次国务院会议后，当面问李鹏总理有没有要调动我的工作这回事。李鹏说，是研究过。他说，中央考虑，下次政府换届，如果邹家华同志继续兼任国家计委主任，你的工作就不动了，仍留任体改委主任；要是家华同志不再兼任，则调你任计委主任。不久，中央召开工作会议，在一次小组会议进行的过程中，朱镕基同志把我找了出来，告诉我，中央已经决定，邹家华不再兼任国家计委主任，调我任计委主任，并说江泽民、李鹏和他本人都全力支持我到计委主持工作。

1993年3月，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一届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，我被任命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。对于我要出任的这个职务，它的分量、工作的艰巨性和复杂性、它所需要的人望，我还是有点自知之明的。在我以前，先后担任国家计委主任的有高岗、李富春、余秋里、姚依林、宋平、邹家华。我

是担任这一职务的第7人。同他们比较起来，我在党内的资历最浅，水平、经验和贡献都远不能同他们相比。我曾经先后担任过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、上海市计划委员会主任（兼），深知计划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。计委虽是经济业务部门，工作中要讲经济、讲业务，同时它又是党和政府管理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综合部门，工作中更要讲政治，讲中央与地方、全局与局部、当前与长远的关系，要处理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错综复杂关系，是经济社会矛盾集中的部门，许多重大问题不是单纯从经济角度就能处理得好的。

在到国家计委机关上班后的第一次干部见面会上，我在表态中讲道，中央决定调我到计委工作，我知道这是一项繁重的任务，我会努力去做，希望能得到全委同志的支持。我已经多年没有直接从事计划工作，想先了解一下工作情况，找各司的同志听听意见。我强调说，只能是我找你们，不能由你们来找我。会后，有位熟悉的同志对我说，你这句话大家表示不大好理解，为什么只能是你找别人，而不能让别人找你呢？我说道理很简单。我初来乍到，不想先入为主，也不想别人对我施加影响。我会按照中央的指示精神和各方面对国家计委的意见，主动地、不带偏见地了解情况，听取意见。想听什么，不想听什么，都由我自己决定。与我的任务不相干的事，我都不想扯进去。什么事情都往我的脑子里灌，我会六神无主，陷于被动。他说，你这一着棋倒也是走得有道理。

我的这次工作变动，从改革计划经济模式的意义上讲，可以说是从改革的动力——国家体改委的工作岗位，一下子成了改革的对象——国家计委的工作岗位。这个工作角色的转换，又正赶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发生根本性转折的时期，也就是计划经济

要在中国最终消失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正式确立的时刻。我感到有点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味道。过去对别人“指点江山”、“坐而论道”，现在则要轮到自己真刀真枪地干了，麻烦和考验会扑面而来，说话做事都必须分外用心。这种从改革的动力到改革的对象的经历，也使我有了一种特殊的感受。

1992年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后，社会上对国家计委的职能定位有种种议论，最尖锐的意见是西部一个省的全国人大代表，建议撤销国家计委。国家计委的机关工作人员本身也有点思想混乱，对于今后的工作去向感到无所适从。1993年初，国家计委召开委务会议，会上有的同志提出计委工作“有位”、“有为”的问题。还有的同志说，过去国家计委机关门前是车水马龙、门庭若市，现在是车少人稀、门可罗雀，有些失落感。我到任后，他们向我汇报了这些反映。我表示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既然决定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，就不存在“位”的问题，有了“位”就要“为”，而且要努力“为”好，也只有“为”好了，才有更好的“位”。我一直认为，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改革，绝不是、也不可能是让政府在短时期内完全失去作用。中国要搞社会主义现代化，要做的事情很多，而且底子薄，国土面积辽阔，经济发展极不平衡，资源条件和建设能力都差异很大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也需要一个过程，许多重大问题没有政府的倡导、规划、推动和协调是不可能得到解决的。

不久，新的问题果然推到国家计委面前，这就是宏观经济越来越热，地方和部门各行其是，而中国的市场又很不成熟，“看不见的手”在兴风作浪，“看得见的手”怎么办？作为政府的经济综合管理部门，国家计委要不要“为”？能不能“为”？怎样“为”？

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，我开始了国家计委主任的生涯。

二、中国经济再度过热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曾多次发生经济大起大落的波折现象。我查了1953—1996年44年间中国经济的历次波动情况。在44年中，大的波动有5次，其中经济增长率波动在两位数的有4次，覆盖的时间长达20多年，被一些干部和经济学家称之为“折腾”。在历次五年计划和大的调整中，波动最大的峰谷差是1958—1962年的大起大落，最高年和最低年的经济增长率相差高达51.7个百分点。波动最小的是1992—1996年，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起伏落差只有4.6个百分点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经济波动最小的一次。最高年和最低年的经济发展波动过大，对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是很大的，有的是破坏性的影响，造成经济大步倒退，多年都恢复不了元气，教训极为深刻。历年波动情况见下表：

中国经济增长率历次波动的峰谷落差

波动起止年份	最高与最低年份峰谷落差 (%)
1953—1957	9.6*
1958—1962	51.7*
1963—1968	24.2*
1969—1972	20.4*
1973—1976	11.0*
1977—1981	6.5
1982—1986	6.4
1987—1990	7.8
1992—1996	4.6

注：带*者为国民收入增长率的峰谷落差，不带*者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峰谷落差。

总结历史，这里面有些什么值得研究的现象，有哪些教训值得后人引以为鉴，避免重蹈覆辙，把教训变成引导国家健康发展的软实力。我认为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，主要是受“左”的指导思想的影响，领导人不尊重客观规律和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，造成了反反冒进的失误，“大跃进”的失败，直至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十年破坏。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，则有两个现象值得深思和总结，一个是投资饥渴症，一个是政府换届的政绩效应。这两者的结合和相互作用，便催发经济过热，发展失控，造成新的经济波动，甚至是很大的波折。

投资饥渴症是匈牙利学者雅诺什·科尔奈在《短缺经济学》一书中最早提出的观点。他在书中讲道，在社会主义经济中，没有一个企业或非赢利机构不想得到投资。投资饥渴是长期的，不存在饱和问题。例如刚刚完成了一项投资，暂时满足了投资饥渴，很快又会产生新的饥渴，而且比以前更加强烈。投资饥渴症概括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普遍现象，讲得也很形象。我认为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，投资饥渴症同样是一种普遍现象，应当作历史的全面的分析。一个国家要发展、要进步，必然要进行建设，对投资的饥渴就是对建设的渴望和追求，它有正当的一面，可以起到唤醒人们觉悟的作用，可以提高发展的积极性。问题是饥渴的内容和饥渴的程度，饥渴的内容不恰当，饥渴的程度失控，就会带来负面的效应。而过度的饥渴一旦成为政府行为，成为受个人功利主义驱动的执政目标，又失去市场的正确导向和发展的理性指导，它的负面效应就会迅速膨胀，引发经济过热，发展失控，直至走向良好愿望的反面。

我查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历次经济过热、投资膨胀与政府换届的关系，它们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同比关系。下面的这张表，列出了历次政府换届的当年和第二年，国民生产总值和投资都双双攀升的情况，而这种攀升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过热，导致资源配置“错位”，物价上涨，引发经济生活混乱，以致不得不进行治理和调整，并付出更多的代价，让社会的总供给与总需求恢复到正常、合理的区间。

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次经济扩张、投资膨胀与政府换届的关系

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8年2月26日—3月5日	当年（1978年）比上年（1977年） GDP增长11.7%，投资增长16.2% 第二年（1979年）比上年（1978年） GDP增长7.6%，投资增长28.2%
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83年6月6—21日	当年（1983年）比上年（1982年） GDP增长10.9%，投资增长16.2% 第二年（1984年）比上年（1983年） GDP增长15.2%，投资增长28.2%
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88年3月25日—4月13日	当年（1988年）比上年（1987年） GDP增长11.3%，投资增长25.4% 第二年（1989年）比上年（1988年） GDP增长4.1%，投资增长7.2%
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93年3月15—31日	当年（1993年）比上年（1992年） GDP增长13.5%，投资增长61.8% 第二年（1994年）比上年（1993年） GDP增长12.6%，投资增长30.4%
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98年3月5—19日	当年（1998年）比上年（1997年） GDP增长7.8%，投资增长14.1% 第二年（1999年）比上年（1998年） GDP增长7.1%，投资增长5.1%
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2003年3月5—19日	当年（2003年）比上年（2002年） GDP增长9.1%，投资增长26.7%

分析表中的相关数据，可以看出政府换届的政绩效应，除了1989年受政治风波的影响，GDP只增长4.1%这个特殊的例子外，其余各次换届的当年和第二年，GDP都是高位增长，达到或者接近两位数的增长。除了个别年份外，投资更是高位增长，成倍或数倍地高于GDP增长速度，成为催发经济过热的主导因素。

1993年的经济过热不同于以往的是，这次热得快、热得猛。1992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4.2%，工业总产值增长24.7%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44.8%，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8.6%，这些数据表明，1992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示出过热的迹象。在这个基础上，1993年上半年的各项指标再创新高，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达到30.2%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率高达61%，35个大中城市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7.4%，6月份高达21.6%。这种形势的出现有几个重要原因：第一，经过15年的改革开放，中国的市场环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，经济运行机制、人才成长、经验积累都为加快发展创造了条件；第二，经过多年积累，经济实力增强，特别是东部沿海地区的开放，外资的进入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，都为加快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物力和财力；第三，邓小平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，破除了多年禁锢人们思想的理论迷信和思想束缚，极大地激发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热情和加快发展的积极性。

1993年，也是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的政府换届年，正像我在上面所分析的，各地的新一届政府产生后，都有急于要多做些事情的愿望，换届政绩效应应运而生，神州大地，一片大干快上的景象。

三、宏观经济调控的酝酿、决策和实施过程

1992年第一季度以后，中国经济不断升温，特别是一些违规、违纪甚至是违法的做法，造成了金融市场混乱，投资失控，物价上涨，干扰和损害了改革开放的大局。面对这样的形势，应该采取什么对策？第一种选择是听其发展，不忙采取措施，甚至认为，这是好形势，不必担心。这种选择有可能使问题越积越多、越积越大，应对措施失去最好时机。第二种选择是采取过去使用的老办法，用行政命令进行治理整顿，全面压缩，基建项目下马，生产指标下调。历史经验证明，这种办法代价太大，也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环境。第三种选择是审时度势，研究采用新的举措，使经济逐步降温，最终实现“软着陆”。不管选择哪种做法，统一思想、提高认识都是前提。首先是各级领导干部，特别是省部级领导干部，必须认识一致，做到令行禁止。在中国现实的政治经济条件下，做好思想政治工作，统一认识，既是我们的政治优势，也是取得全国行动一致的重要组织保证。1996年下半年，我在同不少国家的政要和经济界重要人士交谈中国的宏观调控时，他们都认为，这是中国的政治优势，他们的国家做不到。

1992年，全国各地的建设摊子都铺得很大，层层搞开发区，连乡一级也搞，到处都是大兴土木，挑灯夜战，建设的规模远远超出了国家和地方的承受能力，各类市场混乱。国家计委从实际工作中已经感受到不收缩不行，但真正做起来，却有不少顾虑。主要的担心是，实行“急刹车”，对固定资产投资大砍大削，基建项目大批下马，可能见效快，但震动大，牵动面广，留下的后遗症长期难以解决。我在地方和企业都工作过，

宝钢和4套乙烯项目的下马就让我亲身尝尽其中的艰难困苦。思想工作不好做，实际问题也不好解决，给国家、企业和社会都造成了很大的负面效应，政治上也影响不好。因此，我赞成不搞“急刹车”，不搞“一刀切”，而是按照中央的指示，抓住机遇，深化改革，把群众的积极性引导好、发挥好、保护好，对不同地区、不同产业实行区别对待，做到有上有下，有进有退，进退适度。这种做法过去没有搞过，没有经验，能否搞好心里没有底。我当时的心态是，既担心经济过热，怕温度降不下来，怕长此下去要出更大的问题；又怕措施太软不起作用，还顾虑地方的同志有意见，措施落实不下去。这些顾虑，既是我个人的，也是国家计委机关多数同志的看法。大家希望这次宏观调控能走出新路，不要有过多过大的后遗症。除了这些，当时我思想上负担更大的还是怕对邓小平的指示理解不好，在执行中犯错误。我在前面讲过，我到国家计委工作，资历、声望都让我背不起工作未做好的名声，也没有“资本”承担这样的名声，更得罪不起各路“诸侯”，使以后的工作难做。我已听到个别省的书记、省长对我有意见，说都是我反映情况把问题说重了，促使中央下宏观调控的决心。其实这是把我高抬了。早在我到计委工作以前，中央就已一再指出经济过热，并着手研究和采取措施。

我现在回忆，整个宏观经济调控的酝酿、决策、实施过程，可以概括为以下4个大的步骤，其中有些重要工作是交叉进行的。

（一）统一认识

前面已经提到，对于1992年第一季度以后出现的形势，全国上下认识很不一致。据我接触到的各级干部，首先是省部级干部，议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为3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是对形势